

过新年

光阴弹指，又届岁除，不觉想起从前过新年的一些琐事。按清人笔记，于京中过年习俗，多有述及。但大都略似提纲，语焉不详。过来人看了，总觉得不过瘾；现在的青年看了，又得不到具体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铺叙一番。

小时候盼望过新年，不只是为了穿新衣服，吃好东西，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吸引着我。因此今天讲起五十多年前过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如在目前。

老北京忙过年的事，一般由旧历腊月中旬即已开始。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起，就算是“过小年”，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为北京流行的俗语。关东糖有作瓜形的，故以“糖瓜”称关东糖。所谓“花”，指用红绒或杂色绢做的假花，小姑娘戴在头上的。一种红绒的“喜”字，不仅新年戴，凡结婚、作寿等喜庆事，都少不了它。“炮”指爆竹，是男孩子喜欢放的。

灶王爷，照例供在厨房大灶旁边。一般全把画像贴到墙上，在下面钉个三角木架，架起一块小木板，当作桌子，以便放香炉、蜡扦和供品。蜡扦，即烛台，多以铜或锡制成，其上有铁扦直竖，以插蜡烛，故京语呼为蜡扦。灶王爷像，各纸店和香蜡铺均售。木刻加彩色，印制甚为粗劣（从前北京人称卖纸张文具的商店为纸店，货色齐全，比较讲究的大文具商店如琉璃厂的荣宝斋、清秘阁之类，叫作南纸店），你去买灶王爷像，不能说“买”，要说“请”，以示尊敬。

古代祭灶用黄羊，据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清代内廷尚用之。民间就主要用关东糖，即糖瓜，或南糖了。祭灶时，供上糖瓜，焚香礼拜之后，就把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和金银镮、黄表纸等

(金银铤,指用金黄色和银白色锡箔折叠成金银锭形状的东西;黄表纸,是一种黄色的既薄且软的纸,本为祭神祈祷写表文之用,故名。旧时焚此二者是作为献给鬼神的财物的)一齐焚化送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述职”禀报人间善恶去了。直到除夕接神时把新“请”来的灶王爷像再贴到墙上,依旧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北京原有“灶王爷上天——好话多讲”这一句歇后语。上供祭祀即为请他美言;但用糖瓜作供,又有粘上灶王爷的嘴不让他多口之意。虽似矛盾,却显示了一种幽默感。

照我家的老规矩在祭灶的这一天还要在院内立起“天地桌”来把一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陈设香炉蜡扦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红纸写上“天地神祇之位”供在中央。每天早晚焚香礼拜以祭天地之神。从除夕迎神起正式致祭到新年的正月十五,过了灯节方才撤去。供品多为干果如荔枝干、桂圆干、花生、栗子、红枣等等分装八碟陈列桌上。也不有少家用蜜供和大月饼当供品。蜜供是一种蜜制的面食,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色作金黄顶尖下方高矗如塔。大者高达数尺玲珑剔透真像很好的工艺品。月饼则是为自来红大块在下小块在上,一块一块地重叠起来,也很好看。那时北京著名的糕点铺正明斋,可以预订过年用的蜜供和月饼。蜜供要多高的月饼要多大的共若干斤顾客与店方当时说妥由店方出一单据顾客可以分期付款每月交一点钱到年底取货叫做“打蜜供”。这样零星交钱数目甚小不成负担对小市民是一种方便。店方先得货款,也有好处。不过拿蜜供放在院内陈列,风过沾土,不宜久置。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日摆到正月十五去皮冲洗依然可食。

祭灶的时候,爆竹之声盈耳,非常热闹。从此,小孩子开始过年可以不断地燃放鞭炮而大人们正在忙着“年事”买年货、做年菜,给小孩子准备新衣鞋帽等等。把金银锡箔折叠成纸铤,就是老太太们“忙”的事情之一。除夕之夜照例不睡觉叫做“守岁”。大人们或打牌做竹城之战,或者下棋谈天,以消永夜。小孩子主要是

放花放炮，也有的玩升官图。升官图是用一张像棋盘一样的方纸，上面印着‘状元’‘榜眼’以及各种官位的名称，靠着掷骰子的点数和彩色来定升降。大家围炉共坐，笑语喧阗，喜上眉梢，欢腾室内。这样玩到将近天亮的时候，大人孩子全累了，就歪在床上小睡片时。等天亮已经为明年的元旦，要起来出门去拜年了。“今年只今日，明日是明年”说的就是这个除夕。

元旦有一件小孩子很感兴趣的事，叫做‘踩祟’。除夕之夜，把许多干芝麻秸，一根一根地扔在院子里，分布均匀，四隅皆满。元旦早晨起来出房门，一下台阶，走入院内，就把芝麻秸踩得嘎嘎作响。大家你来我往，直到芝麻秸全被踩碎，才算完成了‘踩祟’的仪注。“碎”与‘祟’同音，取一年开始驱除邪祟之义，大约和古时在门口立桃符，挂松柏枝的用意相同。小孩子们总是一根一根地挨着个儿踩，非常认真。北京四郊的农民，趁农闲的时候，在腊月中挑着一担一担的芝麻秸和松柏枝等入城叫卖，即适应这个“踩祟”的需要而来。街头巷尾，常常可以听到‘买芝麻秸来’的吆喝声，买的人很多。松柏枝是用小绳系起来，挂在窗边和大门的门框上的。那时我家在院角砌了一个砖灶，不断烧柴锅贴玉米面饼子吃。每年踩碎的芝麻秸，即扫起来做燃料，贴一锅饼子，这又可以说是废物利用了。

只是从正月初一到初四这四天，吃的都是剩菜剩饭，叫人不满意。因为正月初五这一天叫‘破五’，不到‘破五’是不能用生米做饭的。所以只好早做出好几天的饭菜，用大圆笼（一种用竹木制成的大型圆形食盒，有盖可以开合，形状略如蒸馒头的蒸笼，装起放在院子里冻着，当做天然冰箱。吃时取出来加热，味道自然不如新做的好。我家那阵儿，总是在除夕，大家动手，包出许多饺子存着，有荤馅的，有素馅的。饺子包多了，不好存放，于是有人出主意，用薄木板钉成簸箕的形状，装上饺子，一层一层像笼屉一样地叠起来，有敞口的一边通气，饺子既压不破，也坏不了，成为新年存饺子的一种‘创造’。初一早晨吃素饺子，初二至初四早晨吃荤饺子，吃得人腻极了，只盼到‘破五’弄点新鲜的，换换口味。因为饺子以薄

皮大馅为贵 新年的饺子不能煮破。所以得要皮厚馅小 怎能好吃？现在想起这事 觉得很可笑。老规矩不知是谁定的 既然不方便 为什么还非遵守不可呢？这大概就算“约定俗成”吧！其根源恐怕还是迷信。

一到正月初一 不拘见了街坊邻舍、亲戚朋友 都得拱手作揖，说“新喜 新喜 发财 发财”。同时安排好拜年的日程 今天去几家，明天去几家 怎样顺道 要有个算计。不过 这件事实在没意思 你给我拜年 我得回拜 我先到你家 你也得照样登门。这种“繁文缛节”，虽然彼此厌烦，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先行破除。经常是此来彼往 交错于途 谁也见不着谁。有时在路上相遇 互道新喜 然后一揖而别 说声“两免”算是省了事。有车的“大人先生”们 常常叫仆人坐着空车 拿着名帖 到处拜年 只在人家门口向门房举着名帖，说声某老爷来拜年 对方仆人就回答：“家主人不敢当 挡驾。”于是拜年的仆人驱车去往另一家。这种“以空对空”的拜年方式 明朝已有之，清末民初犹盛，到后来就发展成了有了固定的台词。双方仆人作一番相应的对白 即完成了主人间的拜年“仪注”这也真得训练有素才行。

孩子们给长辈拜年，无论在家或走亲戚，都得真磕头。一般是在堂屋的方桌、条案、大掸瓶之前 扬尘舞蹈 跪拜一番 然后得一个红纸包的压岁钱，一块银圆 固为厚赐 半圆也不算少。我小时还特别喜欢袁头的半圆银圆，觉得小巧可爱，而舍不得用呢！小孩的财路 除去磕头拜年得压岁钱之外 就是砸“闷葫芦罐”了。所谓“闷葫芦罐”是一种泥烧的罐子，略如现在街头的果皮箱的样子，而小得多，只上端有一个小缝，能容下一个铜钱。孩子们把平日大人给的零用钱 节约下来 有一个半个的 都由缝内投入罐中。因为钱入之后 即不能出 只有砸碎 才能取用 所以叫“闷葫芦罐”。积少成多 逢年节要用钱时 就把罐子向地下一摔 哗啦一声 铜钱满地。捡起来数一数，踌躇满志，仿佛一下子成了富翁，高兴地拿着它逛厂甸买空竹或大糖葫芦去了。

过新年贴对子(即对联)也是应景的老例,一般都贴在大门的两扇门上。有的因为门扇上已有刻好的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表示门风的永久性的句子,过年不能更换,就另外用红纸写两个小长条,分贴在两边的门框上。联语如“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等,都较常见。一些小户人家,无人能写,或者图省事,就到门口的对子摊子上买一副来贴。摆对子摊的,以落魄文人为多。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般都是用一张方桌,上设纸笔墨砚,把用红纸写好的对联,横披(即横幅)喜字、福字等等,大大小小的,挂墙上,或压在桌子边,任人选择。也有自己拟好联语,请摆摊的人临时书写的。无论买现成的或定写新联的,全用不了多少钱。一些小商店,门上贴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对联,来自对子摊上的亦不在少数。据一位摆摊的人说,年前这几天,如果买卖好,可以赚两、三块钱。三十年代初,北京物价相当便宜,拿一块“大洋”上街,能买一“洋车”(即两轮的人力车)东西拉回来。两、三块钱是个不算太小的数目,够过一个肥年的了。

逛厂甸儿

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街分东西，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亦曰海王庄，以其地有琉璃窑，故称琉璃厂。厂甸，原指窑前的一片空地而言，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公元 1917 年于厂甸旧址创建海王村公园。自明代起，书肆即荟萃于琉璃厂，至清季而益盛。除书肆外，古玩、字画、碑帖、文具以及珠宝玉器商店，鳞次栉比，形成一条文化街。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琉璃厂街头巷尾，到处设摊，食物、玩具无所不有，书籍、古玩、字画等亦皆陈列上街，游客骈阗，异常热闹。北京人于此际来游，称为“逛厂甸儿”。自清乾隆间即有此俗。在清人笔记中，如乾隆时成书的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和光绪时成书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都提到琉璃厂，而所叙内容有异，可借以考知清初至清末这里街巷面貌的变化。潘荣陛说：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之西。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阴万态，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数十仞，可以登临眺远。门外隙地，博戏聚焉。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

这是康熙、乾隆间琉璃厂的情形。这里有高阁、石桥、茂林、烟水，景致幽胜，乃以窑厂为中心的游览区。春节时搭棚挂灯，点缀新年，犹如古时过上元观灯的习俗。到了清末，则琉璃厂景物全非，平日只是一条文物街，过春节，则成为一个热闹的庙会所在。因此富察敦崇写道：

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

也。街长二里许，麇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富察敦崇叙述的光绪间春节厂甸种种，已和近代所见，大致相同。可惜他说得过于简单，使人无法知道具体的情景。我从1927到1936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虽然兴趣爱好，随着年龄而变化，由买食品、玩具，到买旧书、旧画，逛的范围，由大而小。可是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因此想给富察敦崇作一回逛厂甸的“读书”。

除夕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在新年元旦的清晨逐渐稀疏下来。八点过后，由虎坊桥缓步向西，刚往北转，入新华街，就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了风车梆梆作响。风车是过年时北京儿童喜欢买的一种玩具，用秫秸杆扎成架子，四边安上小圆轮，轮上各置小鼓，迎风摇动，小槌即敲鼓出声。随着人流前进，不仅东西两面一个挨一个的货摊，陈列着的五光十色的物品，使人目不暇给；四下里各种叫卖的声音，也令人应接不遑。“山里红，就剩两挂了，谁买？”买一捆香草，回去熏屋子吧！”山里红，为北京人对红果的俗称。近郊农民挑选个大而色润的红果，用小绳穿成一大串，挂在脖子上或套在双臂上来卖，每串称为一挂。所以北京有“卖山里红的说睡语——就剩一挂了”的歌后语。香草是用蒿、艾之类晒干捆扎成束来卖。这些都只站着吆喝，招揽顾客，并无货摊。加上这边选空竹，抖得嗡嗡盈耳，那边挑“步步登^①”吹得扑扑作声，红男绿女，此往彼来，衣彩鲜明，肩摩踵接，儿童笑语，一片喧腾。交织成节日浓厚的欢乐气氛。至于举着风车和大糖葫芦的^②，则大都是游玩已毕，要回家的了。

由新华街再往北走到十字路口，东西即琉璃厂街，海王村公园，坐落在东街西口路北。一到园门口，就有人拿着用布制成的掸子，为你掸掸衣上的土，嘴里再说两句吉祥话，你得掏出一两枚铜

元给他。园内大部分是古玩书画等文物店，分列两边，各自出摊售货。园中央搭着一座高台，上设桌椅，出售茶水。可以上去品茗歇腿 俯看游人。园东小巷内路东有一座吕祖祠，旧时香火很盛，很多人来此求签^③。出园再东，路北为火神庙。“民国”初年，曾称“文化商场”，乃珠宝玉器之集中地。货摊密集，晶莹夺目，而真伪相杂，索价甚昂。如能识货，于此亦可得珍品。

琉璃厂东街路南，还有一家小铺叫作信远斋，以售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出名。冰糖棋子以冰糖制成，形如围棋子而色似琥珀；用黄色纸盒盛之，平列一层层，晶莹可爱。冰糖葫芦以小竹签穿单个红果用冰糖蘸成，不象一般糖葫芦的穿成一串；与冰糖棋子一样酥脆适口，异于寻常。夏季卖酸梅汤，装大瓷坛以冰环之，其凉震齿，所制蜜饯干果亦佳。春节游厂甸的人，大都来这里买些冰糖棋子和糖葫芦带回去。

至于书摊，则从南新华街的大沙土园往北，大街小巷，到处皆是。刻本、铅印、影钞的各种古旧书以及过期的报刊杂志，无所不有，可以慢慢挑选，仔细翻阅，价钱也能商量。即使你看了半天，一本都没买，那位看摊的“掌柜”，也不会有何怨言。有时顾客把书弄乱，他也只是默默地照旧整理好，放回原处，不说什么。我有一部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失去上册，无意中从厂甸上书摊上找到缺下卷的残书，以很低的价钱买来，补足我那部书，甚为高兴。我还购得一套清初刻本的苏东坡诗集，上面有清咸丰年间署名信翁的跋语和诗句墨迹；也是逛厂甸的收获。

以前每到春节，琉璃厂等处的书画商，就在和平门外原师范大学附近搭成几座大席棚，悬挂屏联条幅，陈列卷册扇页等，仿佛现在开展览会的样子。但其中凡属大名家的，都系伪迹，小名家的，也伪者大半。四郊居民过年挂画，往往从这里配一副对联，一张中堂，只取其装裱整齐，根本不问名头和好坏；倒颇能为这些书画商销点滞货。内行们称这里的東西为“大棚货”，可见其不佳。不过在我看来，逛画棚，亦为游厂甸之一乐。娱目赏心，何问真伪？如果真有眼

力 则披沙拣金 ,也偶然会得到一些妙品。“悦心未厌无名画 积行惟收有用书 ”我不记得这是谁的诗了 ,它颇能道出我的心情。

从清初到现在 ,沧桑迭易 ,城市日新 ,旧俗亦随时代的推移而消失。今天海王村公园为中国书店的总店所在 ,仍旧是出售书籍、文物的场所 ;火神庙改为宣武区文化馆 ;吕祖祠大部拆去 ,只余大殿一层作某工厂的厂房。现在琉璃厂各商店的改建工程已经完成 ,焕然一新 ,古色古香 ,作为一条文化街 ,将对发扬文化起应有的作用。惟信远斋已远移至朝阳门外。虽在琉璃厂东街路北保留着三间门脸儿 ,仍旧悬挂信远斋的牌匾 ,实际只为一般的糖果铺 ,旧时风味 多已无存 实为憾事。这样追忆旧游 有如梦寐 其中涉及北京的街巷变迁 ,风俗改易 ,或亦可为他日考征文献之一助欤 ?

步步登 是一种用薄玻璃制成的玩具 细长的管子 ,下面作小鼓形 含管吹之 即发出扑扑登登的声音。命名取“步步登高”之意。也写作“不不登”。

大糖葫芦 ,以红果穿成一串 ,贯以荆条 ,长者达四五尺。有的用冰糖蘸 ,上洒芝麻 ;有的用麦芽糖蘸 ,不加芝麻。为逛厂甸者所喜买的有特征的食品。

求签 :旧时各寺庙多以大竹筒 (形状如笔筒而大) ,内盛许多小竹签 ,各标号码 ,置于神案之上 叫作签筒。来烧香默祷的 跪拜之后 举签筒摇动 据飞落地上的竹签的号码 ,找出预先在黄表纸上印好文字的纸条 ,谓之求签。签上一般都先印七言绝句一首 后加说明 表示这是仙佛预示吉凶之语。

小游白云观

1988 年 12 月 13 日《北京日报》第三版刊登了《窝风桥再现新容》的报导 文中写到：

在白云观山门里面，原有一座造型典雅别致，具有神奇色彩和古老民俗风物的单孔石桥，此桥桥洞中间用石头砌死，原名叫“甘河桥”，俗称“窝风桥”。据考，白云观山门及窝风桥均建于明代，后于清康熙元年时重修。

窝风桥为何称“甘河桥”？《白云观制稿》中记道：灵官殿其前为石梁，即甘河桥。溯王重阳甘河遇仙，全真可以开道也。

关于窝风桥的来历传说很多，据说明成化年间，释道对峙，经常斗智斗法。有一王和尚依仗为皇帝宠后当替身出家的身份，在白云观西南方不远建一寺庙，取名“西风寺”，以“西风吹散白云”之意，来镇慑白云观道众。为此，邱处机的后代弟子便修筑了“窝风桥”来“制煞西风”。王和尚只得改换庙名，白云观从此香火更旺。传说毕竟是传说，但窝风桥确实存在。

由此我回忆起自己少年时去白云观小游的一个片断。

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个正月里，过了大年初五以后，我出了和平门，在路上还遇到不少去逛厂甸的游客。我在和平门脸西侧，雇了一头毛驴。赶脚的看我是个学生模样，知道我不会骑驴，就紧紧跟在驴后。由和平门往西出西便门，好有一阵子路程，当时天寒地冻，那“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坑坑洼洼土道上，被过往的大车轧成一道道硬冈子。这驴生性乖张，平坦的大道它不走，专找这些高低不平的硬冈子走。随着它身上铜铃“咣啷、咣啷”的响声，它竟小跑了起来。我骑在驴背上好不难受，只好紧拉缰绳，两腿用劲夹着它的腹部。可能它感到不舒服了，只见它前腿一曲，头一低，

竟把我从驴前揪了下来，跌坐在地上。赶脚的跑过来了，笑着问我摔着了没有。这回他不敢大意了，只好牵着驴走。路上骑驴的多了起来，有些拥挤，好在出了西便门，不远就到了白云观了。

逛白云观的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在进椭圆形的山门时，人们你拥我挤，都抢着伸出手来，去摸山门右上方刻的平面石猴，那石猴并不大，但已被来往游人摸得锃光瓦亮。据说摸摸它可以去病消灾。摸摸它的头可以治头痛，摸摸它的身子可以祛百病。进了山门以后，卖东西的小贩就多了起来，他们多穿梭在游人中间。有卖香草的，有卖肩背成串的山里红的，还有卖小孩玩具拨弄鼓儿和竹管小喇叭的。烧香拜道的人不少，香烟缭绕，响器不绝于耳。

我随着人群来到窝风桥上打金钱眼的地方。“打金钱眼”这是一项引人入胜庆吉祥的民俗活动。桥是南北方向，桥身两侧建有雕花的石栏杆。我在桥的靠左侧一边停了下来。只见桥下石洞前悬挂着一枚直径足有三尺多的大铜钱，中央是方形的钱眼。游人用随身携带的通用货币在桥上换好硬币小铜钱，走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拿起小铜钱向桥下大铜钱的方孔掷去，这就叫做“打金钱眼”。大铜钱的后面桥洞中安坐着一位年长的老道，闭目合睛，盘坐在蒲垫上。据说小铜钱要是打入方孔，尤其要是打中洞里的老道，就要交好运，大吉大利。我用钱币换了十几个小铜钱，一个个的掷去，无论我怎么掷法，也只能打在大铜钱上，听到清脆的打击声，却很难打中方孔，更不用说打中洞里的老道了。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在桥上向下投掷，因角度的关系，是极难打中那方形钱眼的。不过游人并不因难以投入而放弃此项有趣的活动。反而掷钱的人越来越多。小铜钱撞击在大铜钱上的铿锵有力的清脆声音，回荡在那凛冽的寒风中，给这严冬的季节，平添了几分春意。

随着人群我又步入观后面的“老人堂”。这是一排低矮简陋的房屋，约有四、五间。每间屋内迎门都有一座土炕，炕上各坐着一位面容消瘦，身穿褪了色半旧的道袍，闭目不语的老道士。据说这些都是百岁以上的老人。屋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潮湿度，游人出于怜

惘和‘破财消灾’的迷信念头，扔下一些钱币看看就走了。后面还有饲养老猪、老羊的地方，但都比较荒芜杂乱，没有什么可逛的，游人也就望而止步了。

近观报载，白云观已按原样重修，在今年春节，白云观庙会可望恢复。届时窝风桥上打金钱眼有趣的民俗活动，又将重展传统风貌，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

陶然亭

陶然亭在北京市西南隅 右安门内东北。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1695 年)江部郎中江藻于辽金古寺慈悲庵内修建敞厅三间 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 与君一醉一陶然。”句意为亭名 亦称“江亭”。三十年代末期 我以寓所近此 经常来游。当时这里周围都是芦苇、杂树 境界甚为荒凉。但登高纵目 可以远眺西山 习静养心 亦为胜地。近人曹习庵(仁虎)有“穿荻小车疑泛艇 出林高阁当登山”一联,状陶然亭景物极肖,车行芦苇丛中,远望有如乘船。上联形容的确甚妙,下联也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想法。故被公认为绝唱。因为当时北京南城园亭甚少,一些老名士遂常以此为觞咏之地 来饮酒赋诗。公元 1925 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在北京的老名士樊樊山(增祥)、郭匏庵(曾忻)、庄思缄(蕴宽)、王书衡(式通)、赵剑秋(椿年)、关颖人(庚麟)等 邀客一百零九人,于三月三日在此集会吟咏 还出过一本《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 称一时之盛。我来游时 陶然亭四壁 众名流题咏皆遍 琳琅满目 蔚为大观。其中有名画家溥心畲(儒)一诗 墨潘淋漓 挥毫不久 书作行草 苍劲而潇洒 至今印象犹新。大厅迎门匾额为天津名书家华璧臣(世奎)所书“城市山林”四个大字 笔势颇为浑厚。对联有翁叔平(同和)的“窗前绿树分禅榻 城外青山到酒杯”有江峰青(岚)的“爽气西来,拄杖看山宜此地。绿阴昼静,凭栏觅句几闲人”有阮仲明(崇德)的“长戈满地,一亭独幽 客子河梁携手去。把酒问天 陶然共醉 西山秋色上衣来”都于陶然亭的作为游赏之地的特点 能够曲曲传出。翁联的“分禅榻”指亭建于佛寺 阮联的“长戈满地”指八国联军的入侵 是清光绪庚子(公元 1900 年)以后所撰。

解放后,陶然亭被辟为公园,原有池塘经疏浚为两湖,沿岸垂

柳盈堤 柔条轻拂 波光如镜 小舟荡漾 颇有江南情趣。近年累建亭台 广植花木 燕掠低空 蝉鸣高树 风送幽芬 令人神爽 我尝戏呼之为“小西湖”。市内公园 天坛、景山俱无水 北海虽有水 但不似此地之恬静，中山公园仅水榭一勺，后河亦不过一长方池，陶然亭遂以一片烟波独擅胜境矣。

城南游艺园

现在提起城南游艺园，只有六十岁以上久居北京的老人才能知道，这是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北京文化生活与戏剧演出史料的一个大型文娱乐场所。它的兴废，还涉及北京名胜古迹和城市建设的变迁。这里得先从北京的先农坛说起。

先农坛一名山川坛 在北京正阳门 即前门 外之西南 永定门之西 和天坛相对 周围六里 比天坛占地尤大。其中有天神坛、地祇坛、太岁坛、先农坛 藉田也在其内。

辛亥革命后不久，即以先农坛的一部分，改为城南公园，其后又以外坛北面之地分建先农市场和城南游艺园。从此，先农坛即被分割为四部分。先农市场的建筑布置，和东城的东安市场相似，而规模略小，昔日为城南居民经常漫步与购物之所。城南游艺园在先农市场之西 门向北开 大约建于公元 1914——1915 年之间。^① 兹略叙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该园的情况。

城南游艺园开张后 轰动一时 京中士女 倾城来游。尤其是住在前门一带的人，来往近便，更以此为唯一的游憩胜地，有时一日数至。

进园门向西，循走廊即入游艺场。这是一个南北东西曲折相连的大厅 京剧场和文明戏场都在北面 电影场在南面 皆不出厅内，惟杂耍 即曲艺杂技 场在大厅西边门外院内 坐南朝北。

许多京剧名演员 如余叔岩、梅兰芳、杨小楼等都曾在此演出。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些新演员和新编的京戏。如碧云霞演的全本《狸猫换太子》 窦荣芬演的全本《汉光武走南阳》 皆一剧数十出 连演多日 情节曲折 非常热闹 且以新奇的布景道具为号召，颇能吸引观众。

《狸猫换太子》亦称《包公出世》据评话小说《包公案》、《三侠五义》等改编而成。言宋真宗时李妃生皇太子，刘妃与太监郭槐勾结用狸猫剥去头尾掉换太子，谓李后产生妖孽打入冷宫。后又火焚冷宫，并欲暗害太子。李后被救出宫，太子亦有太监陈琳与宫女寇珠设法搭救，由寇珠将太子装入食盒，拟出宫送往八贤王府，行至御河桥边，遭到刘妃和郭槐的盘诘，几濒于危。幸得桥旁土地神暗中维护，得免于难。这一场戏的布景是一桥横亘，桥有多孔，先有一土地神由桥孔走出，欲救太子而孤掌难鸣，就用手杖敲地，另一土地神出一桥孔；随着此敲彼出，接二连三，每个桥孔下都走出一个土地神，站满台上，服装扮相全同，这在当时是个“噱头”。

碧云霞是个女演员，在二十年代颇负盛名，于《狸猫换太子》第一本中，扮演寇珠，声容并茂。解放初，传说她于洗澡时受煤毒晕去，烧伤双脚，虽幸而未死，已成残疾，不知确否。窦荣芬亦系女演员，专唱须生，饰《汉光武走南阳》之光武帝，扮相潇洒，唱做俱佳。其中一场，光武被官兵追捕，藏入废船，兵至搜船，竟不见人，也利用道具炫奇，一般观众以为新异而大声叫好。

《汉光武走南阳》穿插紧凑，颇能叫座，已连演二十余本，盛况空前，一夕荣芬突然逸去，剧遂辍演，后继者。荣芬亦从此销声匿迹，不知所终。

孟小冬为女须生中之佼佼者，其时常在城南游艺园演出。除传统戏外，亦唱新编之京戏。如《七擒孟获》、《阎瑞生与莲英》（亦称《枪毙阎瑞生》）等。后一剧系据“民国”初年实事所编，叙大学生阎瑞生与妓女莲英相识，后因债台高筑，无法偿还，将莲英骗出害死，抢去首饰，案发被捕，判处死刑。剧中人穿“民初”服装，道白作京语，唱腔场面，则一如旧京戏。孟小冬扮莲英之妹，穿短袄，梳大辫，于剧中莲英托梦一场，有大段唱工。当时演时装戏，也是改革京剧的一种尝试，如梅兰芳亦曾编演《邓霞姑》、《一缕麻》等。这在京剧发展史中，都值得一书。此后小冬拜余叔岩为师，遂以专学余派著称，不再演此类新戏矣。

由京剧场再向西行，为文明戏场。所谓文明戏，是指一种在京剧基础上改革的新戏。穿清代或‘民初’的服装，以说白为主，也用锣鼓、胡琴等伴唱，间杂流行歌曲，或弹风琴，不以京剧的唱腔为限。它既不同于时装的新京戏，也不是后来的话剧。当时大家都称之为文明戏。著名文明戏演员张笑影，曾领戏班在此演唱多年。其剧本多据清末‘民初’的时事改编，如《宦海潮》、《锯碗钉》、《春阿氏》等。《宦海潮》演清代彭刚直、玉麟、审案明冤事，京剧亦有之。《锯碗钉》写恶婆婆虐待儿媳事，各地方戏至今仍有演者。

这种文明戏，有说有唱，通俗易懂，颇受一般市民的欢迎。可惜好景不长，瞬即消失。因为在京剧与话剧之间，很难再有第三条道路。它的两结合的形式，不易久存，终归淘汰。更主要的是思想内容跟不上时代。无法与进步的话剧争衡。

京戏、文明戏场的对面是电影场，当时演的当然都是黑白的无声片。贾波林，今译作“卓别林”和陆克的笑片，最具号召力，几乎到处都在以其中的情节作为谈资。

在杂耍场，曲艺和戏法轮换演出，彼此接替。曲艺有刘宝全的京韵大鼓、焦德海、刘德治的相声。刘宝全唱大鼓书，声清韵雅，余音绕梁，当时号称歌王。其《长板坡》、《战长沙》、《闹江州》、《大西厢》诸段子，脍炙人口，聆者叹绝。常有自天津赶来顾曲，又在当天匆匆归去者。焦德海、刘德治为相声界的老前辈，焦说刘捧，亦极为顾客称道。

韩秉谦当时常在此演西洋戏法（俗称“洋戏法”，亦曰“魔术”），穿西装大礼服登台，所演节目，花样甚多，与穿长袍掏大碗的中国戏法不同，使人耳目一新。其最精彩者为水遁、催眠术。演水遁时，台上置大水缸一个，满贮清水，韩秉谦绕缸疾走，突然跃入缸内，头下脚上，水花四溅。旋闻场外铃声，韩已手摇铜铃，快步走来，衣履整洁，身无滴水，观众四顾，惊叹不已。演催眠术时，台上置两椅，其背对向，相隔数尺，一人横卧其上，头脚分置两椅背，中间悬空，以所谓“铁板桥”工夫，使其身挺然不坠。在轻柔的乐声中，韩秉谦手